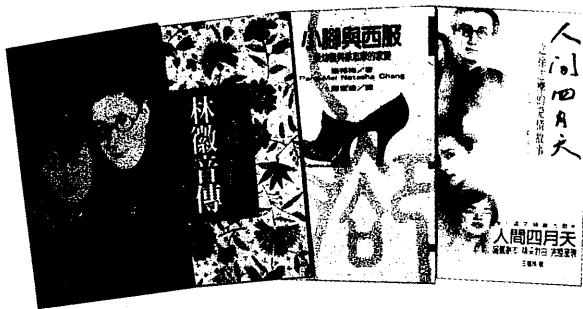


現代文學評論與研究概況

◎ 孟 大

一、從「著摩」開始的文學話匣子

告別一九九九年迎接千禧年到來的台灣文壇，料想不到的是，竟由民初風流倜儻的浪漫詩人徐志摩宛如「死而復生」似地掀起這一年「文學的話匣子」。由於公共電視在元月份八點檔的黃金時段推出描寫徐志摩愛情故事的《人間四月天》電視劇集，造成轟動，不竟形成一股「著了『摩』」的熱潮，除了率先在網路上掀起熱門的討論話題外，更讓與徐志摩間接、直接相關的各種著作在書市上開出長紅的佳績（例如智庫文化的《小腳與西服》、世界書局的《林徽音傳》等書「死灰復燃」，大賣特賣），舊版重編的《徐志摩全集》以及林徽音之子梁從誠主編的《林徽音文集》便博得了不少讀者的掌聲。也由於這股「著摩」的熱潮，進而將民初若干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及其文藝作品）連帶地炒熱了起來，除了陸小曼、林徽音、梁思成之外，餘如胡適、凌叔華、徐悲鴻、郁達夫、李叔同……恍似「文物出土」般，重新站上歷史舞台，任人檢視。



「人間四月天」劇中人物相關叢書（陳文發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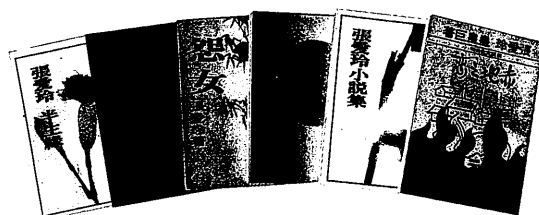
「著摩」熱潮雖由電視劇集肇始，讀者熱烈的話題以及坊間上的迴響，似也盡繞在「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上打轉，儘管如此，如前所述，這多少也帶動了民初文學風的興起，而若干學者如馬森、曾昭旭、陳信元等人，也紛紛加入此一風潮論述的行列，為文發表他們的看法。惜乎此一「民初文學研究風」（「民初」在此指的是一九三〇年代以前）並未真正因此而崛起，類如張堂琦於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此類堅實的研究著作，迄至千禧年結束，猶如空谷回音（金尚浩的博士論文《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的出版，算是特例），令人嘆息，此其一。再者，如上所說，徐、林諸書雖然在書市上締造出空前的佳績（民初文學作品在台灣出版史上從來就沒這麼暢銷過），但讀者（以及觀眾）的眼睛「為之雪亮」的並非其生花妙筆，而是其風流韻事，這也說明了為何聯經會在稍後推出《回首碧雪情——蔣碧徽、徐悲鴻、張道藩的愛情故事》等一系列的民初著名文人（李叔同、郁達夫、張愛玲……）的愛情故事為主的叢書，誠如論者葉海煙所言：「人間豈止四月天？在電視劇浪漫影像暫告落幕之際，我們是該回到詩人真實的心靈，以及他所認真活過的世界，去好好體會浪漫的真趣，和那愛風花雪月背後的莊重、嚴肅及不輕易妥協的生命力」（見〈散文的詩人·詩人的散文〉一文）。怎麼「回到詩人真實的心靈」？那就要真正進入徐志摩諸人所創作的文本中去。此

其二。

總之，「著摩風潮」雖然頗令民初文學「死灰復燃」，終究如同時髦的流行服飾一樣，風潮一過就偃旗息鼓，而文壇及學界對此亦只有評論而沒有研究，殊為可惜。不過，這股熱潮總算讓新世代（尤其是 E 世代）的年輕讀者有緣見識到民初文學的風貌，在世紀末的台灣文壇該記上一筆。

二、性別研究成績不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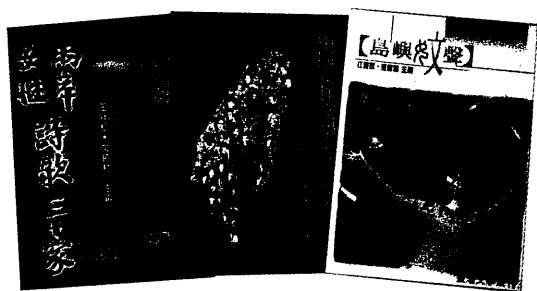
相對於民初文學研究的「貧血」，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性別研究——尤其是女性主義文學論述，到了二十世紀結束前的這一年，可謂是「充血過量」了，但這也是女性文學豐收的一年。以文學選集而言（這亦可視為文學研究的一環），除了有新版的女詩人詩選集（如王祿松、文曉村合編的《兩岸女性詩歌三十家》）的出版外，在小說方面，江寶釵和范銘如主編的於十月間出版的《島嶼女聲——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讀本》（選了十三篇小說），可從中鳥瞰台灣女性小說發展的軌跡。這也可視為台灣小說史的另一種「重構」。在學術期刊方面，由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的



張愛玲作品（陳文發攝影）

《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學刊》於三月中旬正式創刊（由李元貞、何金蘭、范銘如共同策劃），首期內容包括女作家袁瓊瓊與楊千鶴的座談會實況，以及十一位女作家作品的讀書會紀錄，對於女性文學研究的提倡自不在話下。

此外，在專著方面，梅家玲主編的《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一書，可謂是近年來性別論述研究成果的大匯集。此本論文集涵蓋的層面極廣，其中與性別論述相互交涉的領域尚包括國族認同、身體政治，以及「張愛玲研究」。就「張愛玲研究」而言，一九九五年張愛玲過世後，讓當時在台灣的「張學」頓時之間似乎成了一門小說研究的顯學，翌年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承辦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即堪稱代表；稍後（一九九九年）其作品更被刊入「台灣文學經典」，儘管引來不少爭議。這股九〇年代中葉以來持續發燒的「張愛玲熱」，還一直燒到世紀末最後一年的千禧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於十月份還主辦了一場「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有朱天文等人與會）。馬華學者林幸謙（現執教於嶺南大學中文系）在台灣出版的二本論著《張愛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和《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



女性文學選集及研究學刊（陳文發攝影）

張愛玲》，另闢蹊徑，以女性主義及性別論述視角重審張愛玲作品，加強了「張愛玲研究」，也是性別研究的另一項收穫。另一位香港學者李仕芬在台出版的《女性觀照下的男性》，則從另一角度（female gaze），提供了性別論述的研究成果。雖然陳玉玲於七月中出版的《台灣文學的國度——女性·本土·反殖民論述》一書，亦兼涉性別研究的範圍，惟純就專著而言，千禧年中有關性別論述的研究，似乎是外來學者的天下（陳玉玲亦負笈於香港大學中文系）。若非張小虹持續其酷兒（queer）理論的研究（《怪胎家庭羅曼史》），台灣本土學者於千禧年內在個人專著方面可能就要繳出白卷。

縱然如，此梅家玲主編的上書，在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的研究中，不論是在廣闊度或縱深度上來說，都可謂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更是性別研究在台灣文壇的開花結果，誠如她自己所言（見李欣倫〈性別與家國的對話交鋒——專訪梅家玲教授〉一文）：

過去我們從西方引進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觀念，並落實在不同研究領域上，似乎已逐漸開花結果，具有多元而良性的發展，譬如藝術表演、電

影、繪畫乃至於醫療、社會學等層面，皆有不同程度的開展。以我對現當代小說的理解，性別研究在此領域裡似乎被運用得最廣泛，也引起較多的注意，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看到豐碩的成果展現。既然如此，或許可以做個彙整並有系統地呈現。這本書的結集有個很重要的意義：每篇論文分別處理不同議題，而且也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將單篇論文編排至一起時，彼此又可藉由相互連繫與參照，完整呈顯出以性別研究的角度，來面對戰後台灣小說幾個不同面向、研究成果與思考方式，同時給予我們更開闊的視野。

三、後殖民論述當紅

一九九〇年代在台灣當紅的文學評論及研究，除了上所述的性別論述／女性主義之外，便非後殖民主義莫屬了。嚴格而言，後殖民主義同女性主義一樣，都可說是當代（尤指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後結構主義思潮的一環，而其理論取向，一言以蔽之，唯「解」（de-）而已，換言之，女性主義「解」（或解構）以男性為主的文化霸權（也即文學上的父權，patriarchy of literature），而後殖民主義則「解」以西方強權為主的文化霸權（也即殖民民主的強勢文學）。由於台灣曾受到西、荷、日諸國的殖民統治，加上被本土派（或台獨人士）譏諷為「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外省籍）五十年長期的執政，有了這樣「豐富的」被殖民經驗，台灣本地的文學與文化遂足以成為後殖民主義探究的對



性別研究叢書（陳文發攝影）

象，不少本省籍學者便因此而被吸引，以殖民及後殖民的理論與視角做為其文學研究或言論的基礎，陳芳明率先以殖民及再殖民／後殖民的理論做為其撰寫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史觀依據，堪稱代表。

江自得主編的《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於二月間出版，本書是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收有呂正惠、陳芳明、邱貴芬、施懿琳、彭小妍、彭瑞金及游勝冠等人的論文，其論述主題及研究取徑如書名所示，反映的是台灣後殖民文學研究的成果，其中邱貴芬的〈殖民經驗與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一文，從某方面言，不算是對陳芳明的殖民／後殖民文學史觀的一種回應。以殖民／後殖民的角度切入台灣文學史，進而以此為架構（也是一種研究取徑）來爬梳當代台灣文學的發展，當中的確存在不少待檢證之處，此所以發表在《聯合文學》的陳文會招致陳映真等人的批判。雖然其說爭議之處不少（如將一九四五年至八七年間的台灣文學界定為「再殖民時期」），但拿後殖民主義來為台灣文學的發展定位，實不乏新意，誠如他所說（見〈台灣文學史分期的一個檢討〉一文）：

台灣作家對於殖民權力的支配，從未放棄過反抗的立場。三〇年代成熟期的左翼文學，採取積極批判日本殖民主義的攻勢；四〇年代決戰期的皇民文學，則表現出消極流亡的精神。這種流亡精神，在五〇年代反共期與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時期就發展得更為清楚。到了七〇年代以後寫實主義時

期，積極的批判性格又高度提昇。台灣作家與統治者之間所構戰的邊緣／中心的緊張對抗關係，貫穿了整個新文學史之中。後殖民主義所強調的主題是擺脫中心（decentering）或是抵抗文化（culture of resistance）。

除了江自得主編的上書之外，稍後在四月中出版由周英雄、劉紀蕙合編的另一論文集《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其研究主題亦和後殖民論述有關，其中陳芳明的〈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廖炳惠的〈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應鳳凰的〈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諸文，均涉及後殖民文學史的研究範圍，後殖民研究熱從此亦可見一斑。後殖民主義脫離不了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範疇，就台灣後殖民文學的研究者來說，其採取後殖民的論述觀點，本身即不無文化政治的味道，陳芳明撰之台灣後殖民文學史，背後的政治動機，昭然若揭，這也是另一形式的文學詮釋權之爭奪，同樣在文化霸權與及文化霸權之間擺盪。

四、文化研究魅力難擋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做為一門新興的文學研究領域，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越晚近有越發興盛之勢，頗令文學研究者為之側目。有別於以往文學研的方式，文化研究採取（算是借用）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方式，將研究取徑，範圍加以擴大，例如將研究焦點對準在以往所不屑

一顧的流行文學 / 文化、大眾文學 / 文化上，尤其重視影視媒體對於文學所帶來的影響；對於新興的文化現象（諸如旅行、美食風的流行）及其對文學創作的濡化，文化研究也同時保持相當地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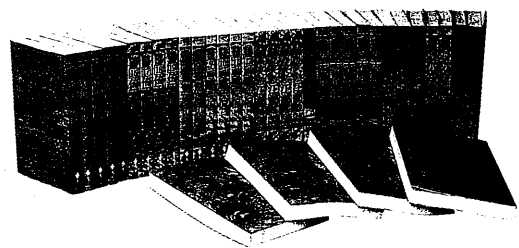
近年武俠小說研究的受到關注便是一例。武俠小說在過去只能被視為茶餘飯後的休閒讀物，幾乎不會受到學界及研究者的青睞（像長期投注心力研究的葉洪生，向來不受注意，直至近年武俠小說研究興盛，始有「鹹魚翻身」的機會）；惟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由於台海兩岸三地競拍金庸、古龍、梁羽生等武俠小說改編的電視劇與電影，形成一股老少咸宜的「武俠熱」，尤其是金庸的小說，幾乎是「所向披靡」，大為盛行，更被一本一本本地改繪成漫畫出版。如斯看來，中華武俠文學學

會於六月間的成立，便可看做順理成章之事。武俠文學學會的成立，對於武俠文學的研究勢將起著推進的作用，除了未來將舉辦武俠文學研討會之外，亦將籌設武俠文學網站、成立武俠文學寫作班，以至於設立「古龍文學獎」。發起人之一的林保淳亦於六月中出版其研究成果《解構金庸》一書，而稍早出版的《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則網羅了海內外研究「金學」的好手，不啻是武俠文學研究的一大躍進，亦不無為「金學」研究學術化「正名」的味道。

除了流行的武俠小說研究熱之外，與文化研究課題有關的尚有近年崛起的旅行文學及飲食文學熱潮。由中山大學文學院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跨越邊界——第二屆文藝與文化研究國際會



長期投注心力於武俠小說研究的葉洪生（陳文發攝影）



《金庸作品集》（遠流出版社提供）

議：旅行與文藝」於五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假中山大學召開。會中發表的論文內容包括：中國古典遊記文學、當代台灣旅行文學、旅行與託寓文學、虛構旅遊文學、作者旅居、流放他鄉與文藝創作的研究、旅行與藝術、後殖民論述、文化研究與旅行等議題，共計七十多篇，是文化研究的一項豐收。此外，由焦桐、林水福主編的《趕赴繁花盛放的饗宴——飲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在年初的出版，也是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展示，可說是近二十年來飲食文學研究最大的一次豐收，論述範圍涵蓋詩、散文、小說、戲劇等文類，以及古今中外各類型的飲食文學。

五、地方文學蔚然成風

地方文學或在地文學（local literature）一詞的涵義，在此是採比較寬鬆的角度來看的。它並非僅指侷限於一個狹小地區（如行政區域的鄉鎮縣市，或地理區域的蘭陽地區、後山等等）並以該地區之風土民情、山川文物為題材（主題兼素材）之創作文學（林韻梅於十月中旬召開的「後山文化研討會」中發表的〈後山文學創作元素及其特有性〉一文，即係針對這種具地理區域特性之地方文學創作手以

檢視），而尚包括在地人士或作家並不以在地素材為寫作範圍或主題的文學作品——就後面這點來看，它所隱含的意義指的其實就是地方（或在地人士）對於文學創作及研究風氣的提倡。

近年來各縣市文化局或文化中心普設各類地方文學獎以及出資編撰地方文學史，即為顯例。先不談地方文學獎及各地文學史編纂的例子，光是地方文學研討會的舉辦，便令人刮目相看了。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於五月中召開，這次的主題是「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顯然其有明顯的企圖擬將地方文學導向地誌書寫的方向，而這種將地方文學創作及研究窄化的意圖，儼然有向主流文學（以台北為中心）挑釁的味道（三月下旬召開的「台中縣作家作品研討會」情形亦同），放大來看，這是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另一種具體而微的「解」訊，以邊緣（地方）抵拒中心，地誌書寫的提倡提供了一種可能。從這一角度言，只是在地人士或作家創作的文學並非一定就是「在地文學」，必須其取材以在地為範圍或背景，才能算是該地的地方文學。

最能落實這種「地誌書寫」的主張，就非地方文學史的撰寫莫屬了。地方文學史的編修及撰寫，誠如上述，近年來在各縣市文化局或文化中心的支持下，陸陸續續開展，從一九九五年以來，即有《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台中市文學史初編》等書相繼的出版；千禧年的四月初，由莫渝、王幼華所撰寫的《苗栗文學史》亦隨後出版，說地方文學史的編撰



蔚然成風並不為過，而這股風潮勢將持續下去。地方文學史的編撰，與地方主體性（subjectivity）之建立息息相關，無形之中挑戰了長久以來的國族迷思（nation-state myth）。

除了文學史的編撰外，各縣市文化局於千禧年續辦的地方文學獎，包括桃園將文學獎、新竹市竹塹文學獎、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南投縣文學獎、台南縣南瀛文學獎、澎湖縣菊島文學獎……，都如期舉行，其中苗栗縣還舉辦了一場文學研習營，對於地方文學的培育與提倡實有莫大的裨益。值得一提的是，由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府及屏東縣政府合辦的第一屆高高屏海洋文學獎，一來這是首度由若干地方縣市政府合辦的「跨區域」文學獎，走出了單一地區性文學的領域，尤其是這三個縣市都在台灣南部，對於獎掖南部地區文學創作風氣有相當的促進作用，也可和以北部（中心區域）為首的各文學獎互別苗頭，以致分庭抗禮。二來在地方文學獎中，這也是首度舉辦的主題性文學獎，有助於海洋文學做為一獨立且強大的文類的發展。從得獎作品的篇名，諸如〈真的可以跟南台灣談戀愛〉、〈裝載南天海邊的瓶中稿〉、〈禮讚墾丁〉、〈旗津心事〉等，足可見一斑，以北部為文學創作中心的色彩已消失不見。此外，南投縣在今年首度設立所謂的「駐縣作家」（由小說家陳若曦獲選），亦為地方文學活動中之創舉。

地方文學活動雖如此述在各地蓬勃展開，惟就文學研究而言，除了若干縣市地方文學史的編撰以及少數研討會中論文的

發表之外，成果究屬有限，仍未見有相關專著的出版；關於這方面，應在鼓勵地方文學創作之外，不妨由地方文學評論之鼓吹展開，各縣市文化局出資出版的文學作品，可多考慮文學評論類的著述。地方文學評論家之養成，恐怕比地方性作家更難。

六、有待再跨步：兒童文學、原住民文學及網路文學的研究

上述五項文學評論及研究的概況，不管其繳出的成績如何，算是千禧年中較為顯目及值得注意者。最後，底下仍有三項可附帶一談的文學評論及研究，儘管其於該年所展現的成果相當有限，有待進一步且深入的開拓：

（一）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的創作，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多到各方面的重視，至二十世紀結束前其實已有相當豐盛的成果，其中童詩的倡行更應該記上一筆。當然，這和各類兒童文學獎的舉辦不無關係，例如二〇〇〇年續辦的兒童文學獎就：有台灣省兒童文學創作獎、九歌兒童文學獎、國語日報牧笛獎、陳國政兒童文學獎、信誼基金會幼兒文學獎等。兒童文學（創作）獎顯然不缺，最為欠缺的是兒童（或幼兒）文學評論獎。

兒童文學評論研究向來較乏可觀的成果，並非危言聳聽，誠如洪文瓊指出的（見《台灣兒童文學史》一書）：

由於台灣的兒童文學研究環境尚未成

熟，在成果方面，可說只有一些點的成就，以教科書式通論性的著作居多。專題性的研究，則泰半是屬於兒童文學邊緣性研究，如閱讀興趣、兒童讀物出版趨勢等等，以兒童文學各種輕型或作家作品等作專題研究的，只有童詩這一部分較為可觀。從研究方法來看，使用較嚴謹的現代學術規範來從事研究的，幾乎屈指可數。一般而言，較時髦的是使用調查研究方法，其餘仍以蒐集各家資料，加以綜合論述的居多。由於缺乏原創性，因此對於理論的系統化和研究面的構成，亦即研究品質的整體提昇，助益不大。這一方面也是台灣兒童文學研究者亟待努力的。

儘管如此，千禧年中仍出版了一本由劉鳳芯主編的《擺盪在感性與理性之間——兒童文學論述選集1988-1998》，這是兒童文學評論的小收穫（惟仍乏深入的研究論文）。值得一提的是五月下旬由台東師院兒童文學研究所及幼獅文化公司主辦的「兒童文學希望工程研討及座談會」，這場研討會算是世紀末對於台灣兒童文學發展的「總結」。這年台東師院兒童文學研究所對於台灣兒童文學的研究投注了極大的心力，在稍早的三月中還主辦了一場「台灣兒童文學一百評選暨研討會」（發表了十一篇論文），儼然已成爲兒童文學研究的火車頭。

（二）原住民文學

自一九九二年文建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主辦了第一屆山胞文藝創作獎以及一九九三年由孫大川等原住民作家投入的《山海文化》（雙月刊）的創刊以來，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與評論就此開展，尤其在一九九六年由《中國時報》與《山海文化》雜誌合辦的山海文學獎的成立，奠定了原住民文學成爲一個獨立文類的基礎。二〇〇〇年這一年，又多增加了一個原住民文學獎（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由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山海文化》及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共同主辦）。雖然如此，原住民文學評論卻極端缺乏。少數研討會中（如第二屆「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雖亦有相關論文之提出（如孫大川的〈原住民詩中的台灣意象〉），但仍屬鳳毛麟角。

在原住民文學評論及研究上較有成績的首推曾任原住民委員會前主委的孫大川，在千禧年中他提出了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表示將與日本真理大學教授下村作次郎合作，預計以三年時間完成「台灣原住民文學系列」六卷本的編譯工作，本身亦將同時整理原住民古老祭典詩歌的英譯，讓台灣的原住民文學書寫走出台灣，邁向國際，令人拭目以待。原住民文學評論與研究，不應只留待原住民作家與學者的參與（孫大川即爲卑南族），如果非原住民族願意投入，擴大文學評論及研究的隊伍，才會有長足的進展。甚且，文學評論的視角也不必侷限於原住民本身的觀點。

(三) 網路文學

網路文學自一九九〇年代下半葉以來已成了台灣文壇當紅的新興文類，尤其是自蔡智恆公開其網戀小說以來，網戀小說於學生群讀者中產生巨大的迴響，惟迄至目前為止，誠如論者所言，其小說創作多半「停留在簡化的情節，加上自創的名句而已」。王桓奇的《電子情師》及迷情小愛的《潮騷的秘密信箱》等網戀小說，都在二〇〇〇年出版，市場反映不惡。耕莘青年寫作會乃在該年年中設立了第一屆「耕莘網路文學獎」，以鼓勵網文學的創作。

嚴格而言，網路文學崛起至今，並未真正發展出其本身所具備的超文本(hypertext)特性——這方面在施善繼、向陽、須文蔚等人的網路詩創作上較有開創性的進展(雖然成果有限)，以網戀小說而言，其表現形式基本上和在平面媒體發表的小說無異，只是發表的載體換成電腦網路罷了；而且由於缺少一般平面媒體編輯守門人對於創作品質的控管，自由上網發表的網戀小說，看來就像是「學生習作」，但最後都被出版在基於市場考量而以平面印刷物出版了。

既缺少守門人「事先的控管」，則台灣的網路文學更需要評論家的參與，扮演「事後控管」者的角色，以提昇網路文學創作的品質及水準，雖然網路文學獎的設置在某種程度上可發揮「篩選」的功用(即另一種「控管」)，以達到促進其創作質素的目的；但文學獎之獎掖只是一時，平時仍須由評論家發揮其針砭之影響力，始能奏效。惜乎從事網路文學評論者極

少，叫得出名字的也只有李順興、須文蔚、向陽諸人，以千禧年這一年而言，相關的評論與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除了須文蔚〈文學創作線上出版初探〉等少數幾篇研究論文外)，貧乏的網路文學評論與研究，似乎與迅速竄紅大量增加的網路文學創作或書寫不能同日而語，亟待評論家及學者的戮力投入。

七、結語

千禧年，面臨世紀之交，理應是個承先啓後之年，事實上，回顧這一年的表現，在文學評論及研究上，這個「承先啓後」的盼望看來似乎是落空了，至少這可從下面二點看出：

第一，延續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文學研究主流的是，性別論述/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的熱潮仍未見衰退，在評論界還是「當紅炸子雞」，這從好幾場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及其會後出版的論文集(見上述)中即可看出，學界與評論界本身的變革似未見開始。

第二，全球化(globalization)做爲一項新起且重要的議題，已在文化界熱烈的展開(例如五月廿、廿一日兩天，東吳大學哲學系便辦了一場「中國哲學與全球倫理學術研討會」)，在西方像詹明信(F. Jameson)、米勒(J.H. Miller)等文論家亦對「全球化與文學」這一課題開始討論，雖然這一新起的評論思潮方興未艾，但在千禧年的台灣文論界，則尚未有人能及——這較諸大陸學界(如王寧等人已有專文論及)顯然有落後勢(二〇〇一年九月號的《中外文學》曾推「全球化時

空交換」專輯，但這已是後話)。

看來，「啓後」的這項工作，似乎要留待下一個世紀的開始，也就是二〇〇一年來完成。雖然如此，如上所述，二〇〇〇年的台灣學界及文論界也未繳出白卷，總算是熱熱鬧鬧地舉辦了好幾場學術研討會，出版了不少文學研究專書（包括論文集），勉力地將棒子傳承下去。